

见东家时仔细揣摩心思，生怕得罪；向东家请假去看看朋友，还要思忖半天；东家没按时给教书钱，自己却顾着体面不敢要，还要跟东家赔笑；吃的是斋饭，盖的是破被；教的课少了，东家嫌先生懒，教的课多了，学生与先生结仇；夏天苍蝇纷扰只能用蒲扇驱赶，冬天寒冷难耐学生皆散只剩老师自己。虽然教书先生苦，但是不教书也没别的可干。蒲松龄将自己艰苦困顿的教书生活，以自嘲的方式编成小曲，最后发出感叹：谁说万般下品，这高些不过五斗腰折。

几百年后，这部收录在《聊斋文集》中的小曲《学究自嘲》，出现在《济南历代著述考》“蒲松龄”的词条下，与蒲松龄其他71种著作排列在一起。每种著作标明了卷数、不同版本以及收藏于何处，有些著作在条目旁还附上了原书的图录。翻阅这些庞杂的著作，原来蒲松龄不仅有享誉后世的《聊斋志异》，还有《日用俗字》、《帝京景物选略》等教授学生用书，《问天词》、《慈悲曲》等鼓词小曲等，在人物的小传下，按照经史子集的顺序排列着。

以同样的体例，《济南历代著述考》收录了济南2900余人的著作7000余种，从先秦的扁鹊，到清末的郭连科，按人物时代先后顺序排列，总数占山东省的四分之一还要多。

“这跟济南疆域的范围不无关系。”《济南历代著述考》主撰者徐泳说，“既然是《济南历代著述考》，那么‘济南’的概念就有必要确定清楚。”济南之名，起于汉初，最初称为“济南国”，到明代以至清朝雍正前期，济南府属四州二十六县，几乎占全省三分之一，德州、泰安、武定和滨州等地都隶属于济南府。

“所以，《济南历代著述考》不仅囊括今天行政区划属于济南者，比如历城马国翰、济阳张尔岐等，在其他时代隶属于济南府的，也一并收录。”于是，淄川（今属淄博市）蒲松龄、新城（今山东桓台县）王士禛等文坛重量级“大腕”及其著作，也出现在这部110多万字的书中。这意味着，从广义上来说，提起济南的名人，不再只有李清照和辛弃疾。

“诗文集在济南的各种著作类型中是最多的，占一半以上，这与济南是省会城市有很大关系，各地士子文人过来赶考，聚在一起时难免唱酬一番。”而作为济南特有的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等山水名胜，自然会频繁被文人们拿来唱咏。

嘉庆七年，李元春到济南拜访好友陈茂才，两人共游千佛山，在山上遥望马鞍山和华山，二人唱和吟诗，诗作收录至《二南文集》。这段佳话被记录于《二南文集》的小序中，并载于百年之后的《济南历代著述考》。

翻看附于其后的书名索引，《明湖韵事》、《华不注山房诗》等作品，都成为文人雅士寄情于济南山水的铭记。

《济南历代著述考》揭秘未被发掘的济南文化圈

济南文人原来如此灿烂

大明湖上曾风光一时的鸥盟诗社，牢骚满腹的家教老师蒲松龄，因后人误抄而被“盗版”的明朝首辅张居正，早已失传的大明湖楹联“当歌仍对清荷渚，作思回记白雪楼”……这些，终于在近日出版的《济南历代著述考》中重见天日。

由山东省图书馆研究员徐泳编纂的《济南历代著述考》一书，著录了济南地区历朝历代的文人著作。这些为进一步丰富和改写济南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素材。

本报记者 陈玮



徐泳在家阅读由自己编撰的《济南历代著述考》一书。本报记者 张中摄

鸥盟诗社里的惺惺相惜

很多文人故事也被《济南历代著述考》记录其中。

书中，历城范垌《新齐音》一条中记载：范垌十分擅长诗古文辞，曾与周二南、谢问山、何岱麓等，在大明湖上结鸥盟诗社，常以七十二名泉为题材作诗。

一个以诗文结社的美谈由此引出。徐泳在编排人物及其著作时，特意将同年、同科人士排在一起，通过他们的作品目录，就可发掘出他们交游的关系。

翻阅《济南历代著述考》，与范垌著录相邻的历城诸生李醉琴，其《醉琴诗》有范垌之序，称李醉琴诗“流利稳成，出尘拔俗”；与李醉琴相邻著录的历城诸生陈葑，其《淡简斋诗草》中收录了寄给李醉琴的诗；历城恩贡周乐的《二南文集》序中，则详述了周乐帮助陈葑料理他父亲的丧事；收录于马国翰文集的《花朝日借周二南（即周乐）、王秋桥、谢问山、朱退旌、李秋屏、彭蕉山泛舟明湖即事四首》，表明了马国翰与他们的交游，而诗中所提及的正是鸥社的活动。由此，一个鸥社的集会活动和成员之间的交游，就初步显现出来。

他们除了在作品上互相品评，在创作上也互相鼓励。周乐认为自己擅长作诗，作文只是闲娱娱乐，并且数量不多，所以不愿意将自己的文章刻版流传，认为多传不如专传。而其好友李元春则不这么认为，他与周乐游趵突泉时，特意打个比喻：“比如趵突泉三个泉眼，涌出的水不过一尺有余，却成为济南第一奇观，散而成为大明湖，带给观赏者喜悦。你的文章不都是没用的，有很多针砭时弊之义，应当流传。”那时的激励，似乎是这些科考失意的士子们最大的安慰。于是，道光二十二年，《二南文集》二卷刻行于世，社中成员相互翻阅品评。如今，这本差点流失的著作，正静静躺在山东省图书馆古籍部中。

张居正著作被误抄成张尔岐之作

这些散见于《济南历代著述考》中的材料还有很多，集合起来，给想要进一步研究鸥社的人提供了珍贵的线索，一些历史也被还原。

济阳张尔岐专注于研究易学，却有一本关于尚书研究的《书经直解》被收录在各个书目中。同时，明代首辅张居正亦著有《书经直解》，这引起了徐泳的怀疑。他找来张

居正著最早版本的影印本，与标注为张尔岐著的原书进行比对，发现竟然一模一样。

“标注为张尔岐的《书经直解》是抄本，说明抄书人据传闻书写，没有仔细调查。”徐泳说，“张居正当时是皇上的老师，这本书应该是他教授时所编的课本。”

在搜集条目时，有一个作者注为“章邑汇庵”的《尔雅宗经汇说》，“这显然不是作者的真实姓名。”同时，徐泳发现其他书目中有章丘举人杨开运的《尔雅宗经》，比对发现，两者为同一本书，而杨开运，字会莽，与汇庵同音。“应该是同人不同字引起的著录讹误。”很多著录为“亡佚”的书，徐泳也在资料的搜集过程中找到了存书。

“目录的编辑是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杜泽逊说。

收录的作品八成未被挖掘

通过这去伪存真的一个个条目，我们感受到的是济南人的精神和品质。

淄川进士孙光辉为官时，被其他官员诬陷入狱。李开先一直为他辩护，历经十年，终于还孙光辉清白，归家不久，便重病身亡。

临邑女邢慈静随夫马拯赴黔中上任，然而马拯却客死异乡，邢慈静带着孩子，扶着丈夫灵柩回乡，经历疾病、穷困和路途险远，未曾放弃。

田告为专心理于深草中作文，读到谬误之语柳文洙不禁击桌而怒，《济南历代著述考》中的这些人物小传，作品提要，仿佛是一幅幅性情的卷帙。看似一个个冷冰冰的条目，背后却都有不为人知的故事。

最值得称道的则是前人保护乡邦文献的努力。乾隆年间德州学者宋弼与卢见曾合辑《国朝山左诗钞》后，又辑《山左明诗钞》。当时益都学者李文藻也参与了搜集工作。宋

弼把《山左明诗钞》稿本交给卢见曾，希望卢氏刊刻行世。乾隆三十三年秋，卢见曾获罪，被抄家，数十万卷藏书都堆在德州官府内。时宋弼官至甘肃按察使，入觐途中死在洛阳。李文藻深恐此书就此湮没，第二年正月赶到德州，托人购买此书，花了三天时间，才从书堆中清理出该书的稿本三十五卷。可是未找到诗人小传。数日后，宋弼的灵柩从洛阳迎到德州。李文藻吊唁后，打开宋弼的行李箱，小传一册正在其中。这年秋，李文藻得授广东恩平知县，就携带这部稿子南下广东。次年夏到任，入冬即着手校刻，使这部收录四百三十一人诗作的山东文献得以问世。

在搜集条目中，偶然碰到在古人文集中提及但在其他目录中没有著录的作品，徐泳也把它们收录进来。在撰写人物小传时，从各个目录或县志、墓志铭和文集中，搜寻零星的材料，加以考证收集。

“想要知道济南有什么文献，哪些是十分珍贵的，《济南历代著述考》提供了这样一份基本的资源。”杜泽逊说，通过这本书，图书馆可以知道采购怎样的书籍，知道哪些书籍应该被保护起来，学者可以知道哪些书没有被整理过，然后去做这项工作。“在传统文献文化越来越重视的情况下，作为基础的目录工作，越来越需要。”徐泳说。

“《济南历代著述考》收录的书80%没有被挖掘研究过。”徐泳说。《济南历代著述考》收录的《榆西精舍集明湖楹联》，辑录着民国文人沈绍盈游览大明湖时随手抄录的楹联，其中绝大多数楹联为历代方志所未著录和提及。现在人们知道的只有“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却不知亦有“当歌仍对清荷渚，作思回记白雪楼”。

“如果史料还没有被大量挖掘出来，怎么能写出可信的济南历史呢？现在是书目发展的顶峰，将来也会有人考证出《济南历代著述考》的讹误。”徐泳说，“但济南的历史，会在这种无休止的研究中愈见丰富。”



背影

罗国杰：早期独尊“集体” 晚年回归儒家

本报记者 张榕博

2015年3月9日，新中国伦理事业的奠基人罗国杰先生逝世，享年88岁。在伦理服从于阶级的时代，他以“个人利益应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利益”的马克思主义伦理主张闻名于世。步入晚年，他承认，早期的理论是错误的。

罗国杰是一位影响了几代中国人思想品德观念的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破旧立新的思潮席卷中国时，我国的伦理学学者们正在为告别几千年中国传统道德后的伦理真空发愁。

如何重建社会规范？罗国杰在当时整理、编辑并推广了马克思主义伦

理学，填补了当时的伦理空白。他的研究成为日后大、中、小学思想品德课的主要内容。比如“集体主义”就是由罗国杰整理提出的，他提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二者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应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利益”等时代规范，他甚至还解释了什么是“共产主义道德”。对待传统伦理，罗国杰曾不止一次称：封建糟粕应当评判地继承，为我所用。

不过，到了晚年，罗国杰却愈发关注起传统文化在中国日常伦理中的作用。他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作品逐渐减少，转为《中国传统道德》、《传统伦理与现代社会》等思考传统文化伦理价值的著作。他曾提出“以德治国”的理论，从1999年到2000年

间，罗国杰为江泽民单独上课的课程名就叫《儒家思想与政治治理》。

晚年的罗国杰被学生称作“现世的儒者”。他曾说，儒家讲求“吾日三省吾身”，他则坚持做到“四省”：“我最喜欢的格言是陶行知先生的每日四问。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

罗国杰承认，建国后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态度是错误的。“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40多年内，我们在对待中华民族传统伦理道德的问题上，从具体实践来说，既受‘左’的思想影响，又受‘右’的思想干扰，没有很好地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否定过多，继承很少。”